

服务业空间分布研究的文献评述

王 向¹ 刘银玲²

(1.国家电网公司能源研究院,北京 102209;2.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北京 100125)

[摘 要] 分别从服务业集聚及其影响、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关系、服务业空间分布与城市层级的关系等方面梳理了相关文献,发现服务业在不同层级城市之间的分布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领域,尤其服务业的空间分布是否也符合齐普夫定律,是亟需解答的重要问题。对中国服务业空间分布全面、细致地测算,是未来服务业可行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 服务业;集聚;制造业;城市层级;空间分布

[DOI 编码] 10.13962/j.cnki.37-1486/f.2017.02.003

[中图分类号]F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410(2017)02-0019-07

一、引言

2013 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 年该比重升至 48.2%,且仍处于快速上升阶段。在一国经济增长从高速向中高速转变时期,服务业保持较快增长,更凸显了服务业对保增长、促就业的重要性。

按照统计分类标准,服务业是门类广泛、行业内部差异最显著的产业,已有文献对服务业增长规律和劳动生产率方面的研究比较全面、深入,对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关系的讨论也较丰富^[1]。在经济较低发展阶段,服务业主要集中于大城市,尤其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而中小城市只是零星存在着传统的生活性服务业。随着全国服务业发展水平上升,现代服务业逐步在各层级城市中发展起来,以及国外服务类跨国公司快速进入中国,这时服务业的空间分布问题日益重要,而地理因素对服务业空间布局的影响较小也是一种误解^[2]。

服务业有两大特性最需关注:一是多数现代服务业活动脱胎于制造业企业,它与制造业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服务业的空间分布与制造业的空间分布密切相关;二是服务业乃最为城市型的产业,即服务活动非常依赖于人口聚集。

二、服务业聚集特征及其影响

(一)服务业集聚的机制和影响因素

集聚经济包括城市化经济(Urbanization Economies)和地方化经济(Localization Economies),Krugman^[3]指出“当今世界上最为壮观的典型地方化经济表现在服务业而非制造业”,且服务业越发达,其空间集聚特征越明显。

集聚经济受“共享、匹配和学习”三大动力驱动,经济环境越利于三大动力的发挥,地方化经济效应实现得就越充分。通过循环累积效应、产业间渗透效应以及创意的传播,地方化经济将逐渐呈现出产业多样化的城市化经济^[4-5]。

传统集聚经济学是在工业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很少有学者质疑其对服务经济的适用性。对此,Moulaert & Gallouj^[6]指出,利用制造业范式难以反映服务业集聚的特点,应纳入社会文化内涵、世界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产城融合视阈下稳步城镇化与新生代农民就业转型协同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3AJY0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向(1986-),男,河北保定人,国家电网公司能源研究院经济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能源经济。

集聚网络,进而有效分离出城市化经济效应,而后者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区位选择和空间集聚十分关键。另外,Pinch & Henry^[7]认为,按照传统集聚经济模式中的距离最小化,进而交易成本降低,不足以使知识性密集型服务((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 KIBS))企业集聚和行业持续增长。

与工业产品迥然不同,服务产品较难标准化、技术进步较慢,目前尚不存在所谓服务业集聚经济的统一理论框架,但退而求其次,国内外经济学界有两条研究进路:一是对工业集聚经济的概念和模型进行修正,以适用于服务经济,例如服务行业间的相互需求较制造业行业间的引致需求更突出,更容易存在多种服务行业的集聚,相反,不同于制造业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集聚更加突出^[8];二是对新经济地理模型加以调整,以适用于分析服务经济集聚。新经济地理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前提下,引入冰山运输成本,提出了新产业集聚理论,陈国亮^[9]在研究中将运输成本替换为信息费用,形成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理论框架,而张勇^[10]将冰山运输成本修正成信息传递成本(包括空间距离、制度环境、信息复杂度和信息技术水平),分析了自由贸易度和知识溢出对生产者集聚的内在机理。Krenz^[11]针对服务行业中间品使用较少的特点,尝试建立了服务业集聚的新经济地理模型。

尽管不同学者分别梳理了服务业集聚的机理,但归纳起来它们分别属于传统集聚经济或经济地理学的解释范围。李文秀^[12]总结指出:首先,本地原有的市场规模是影响服务企业布局的最主要因素,一旦服务企业集聚,就会导致服务产品的平均价格下降,进而服务消费量就越大,结果使服务企业越集聚,这类似于新经济地理中“市场潜能”对服务业集聚的意义^[13];其次,多样化的企业集聚将降低消费者的搜寻成本,而且具有互补性的服务企业集聚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这本身属于集聚经济的内容;再次,城市的本质特征是人才集聚,这属于劳动池子(Labor Pool)效应。王耀中等^[14]将服务经济的集聚机制分为内生机制(吸聚效应和外部经济)和外生机制(互补共生、创新需求和知识外溢),也都属于传统集聚经济学的解释。

服务业集聚的机理是分析服务业空间分布的理

论基础。大量实证研究已经全面罗列了各种影响因素,有些因素可从上述理论分析中总结出来,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信息化水平、基础设施、距离、教育水平/科研投入等^[13,15-17];有些则是其他更复杂的因素,如制度因素(产权保护、法律、政府政策等)、政府规模、城市化水平、社会因素(信用环境、文化程度等),等等^[10,17-18]。而朱玲^[19]的实证研究直接基于马歇尔集聚经济三来源(劳动力池子、中间品共享、知识溢出)展开。

(二)服务业集聚特征的实证研究

尽管有各种理论分析,但实证研究的结论却是另一番景象。总体上,服务业的集聚强度不如制造业集聚,从不同空间层面看,服务业企业更容易在相同邮政编码(Zip Code)区域内集聚,而制造业企业更多在同一县或者州层面集聚^[20-21]。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服务业增加值和服务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同时,受到科技进步、信息技术发展的影响,服务业空间集聚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尤其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KIBS),它们通常少数大城市中集聚,而且集聚程度越来越高^[22-23]。Illeris和Sjoholt^[24]研究北欧国家后发现,它们的首都集聚了大量的生产性服务企业,首都与发达城市的区位熵都大于1,其他地区的区位熵小于1。Bennett等^[25]研究英国的商业服务集群后发现,这些集群以33%的空间容纳了76.5%的商业就业。Krenz^[26]的研究发现,欧盟范围内批发零售、租赁、研发及其他商务活动的集聚较其他部门越来越明显。

尽管生产者服务业较消费者服务业有更高的集聚程度,但是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服务业的集聚程度也存在显著差异,而且这些差异的比较难度较大^[28]。因为服务业集聚不仅深受城市规模影响,也因工业结构、市场经济模式、地理位置等跨国差异而不同。因此,在研究服务业布局的一般规律的同时,个别国家的案例研究也很重要。

当前,关于中国服务业空间布局的实证研究非常丰富。整体而言,中国服务业集聚程度不高,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较高,其中东部沿海的服务业就业更为集中,且平均工资和利润水平均高于中西

部地区;而生活性服务业集聚性较低,随人口居住而布局^[13,28-29]。在就业与产值的分布上,Wang^[30]指出,1979-2007年间服务业就业较为分散,而服务业产值在地区分布上的不平等呈现出“先降后升”的V型特点。在地区研究上,长江三角洲地区服务业集聚程度更明显,在该地区内部上海市服务业区位熵高于江苏、浙江,而且行政层级高、经济体量大、沿海的城市服务业集中度较高^[31-32];在分行业研究上,批发零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等集聚度更高,行业间服务业的集聚模式也不同,而且省间传统服务业集聚度差异在缩小,但新兴现代服务业的差异在扩大^[33-34]。在时间维度,服务业集聚趋势不断上升,其中,东部地区尤快^[32]。

(三)服务业布局的效应分析

服务业的集聚效应,首先表现在对区域或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特别是快速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业,日益成为地区竞争力提升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它对区域经济的作用机制如下:一是通过市场信息、技术创新和管理变化塑造区域创新系统,改造或是延伸价值链;二是通过协调专业生产过程,实现范围经济;三是服务类产品出口,加快服务贸易发展,等等^[35-37]。

此外,服务业集聚与劳动生产率提高正相关。Ciccone^[38]通过研究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五国服务业和制造业就业密度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就业密度的弹性系数为4.5%;范剑勇^[39]使用相似方法发现,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弹性系数是8.8%,而且在产业空间分布非均衡情况下,服务业集聚将扩大省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程大中和陈福炯^[40]分析了服务业相对密集度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指出服务业及其分行业(房地产业除外)的相对密集度与劳动生产率均呈正相关,而且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的对生产率的积极影响更大,服务业集聚的生产率效应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41-42]。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还会通过专业化效应、竞争效应、外部性等降低制造业的交易成本,不仅能提升本地制造业的生产效率,且能够通过空间外溢效应提升周边地区制造业效益^[43]。在经济增长效应上,王琢卓^[44]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挥积极作

用的有效范围为200公里,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东向西递减。

三、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布局关系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进入了“双重转型”过程,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与从农业传统经济向工业现代经济转型。跨越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优化提升产业结构、提升现代服务业的比重,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其中工业化过程中服务业与制造业相互作用是重要的研究内容^[45-48]。

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关系研究主要源于城市经济学,以Henderson为代表的新城市经济学家发现,一个城市在整个城市系统中所处的层级(按产值或就业规模划分)越高,其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产值比率就越低^[49]。197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城市系统中出现另一个现象:城市间的职能化分工日益突出,即管理、咨询、研发功能等集中在大城市,而生产制造企业逐渐转向中小城市^[5]。

对于服务业与制造业在空间上如何互动,目前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服务业与制造业在空间上有集聚趋势;另一种则主张服务业与制造业在空间上有分离趋势。对于前者,Coffey和Bailly^[50]指出,没有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很难实现新兴制造业的创新、吸纳就业和扩张;薛立敏等^[51]研究发现,中国台湾地区在制造业外移以后,生产者服务业的辐射范围也随着制造企业布局变化而改变;Raff和Ruhr^[52]在研究生生产者服务业和制造业FDI的空间分布时发现,生产者服务业FDI与制造业FDI高度相关;而黄永兴和刘莉^[53]利用中国数据研究发现,不同服务业行业与工业集聚的相关性不同,陈娜和顾乃华^[54]通过联立方程模型方法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分布存在协同效应,但这协同效应在城市间存在差异。

对于相反的主张,Bhagwati^[55]强调信息技术快速应用对生产性服务可远程提供的显著影响;Sassen^[56]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侧重于服务金融和商业,服务业行业间的需求更大,不必然以生产企业为中心;从区域经济上,Noyelle和Stanback^[57]指出,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布局的动力机制与制造业不同,往往制造业企业转向新的“产业空间”,生产性服务企业继续留在大都市区。总之,对于服务业与制造业空

间分布是否存在协同效应分歧,源于不同文献所选择的单位不同,或者不同服务业行业与制造业的空间互动呈现差异。

国内文献也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陈国亮^[9]通过调整新经济地理模型中的成本因素,建立生产性服务业的理论框架,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与不同形态的制造业集聚的互动关系发现:首先,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通过高效的中间投入利于制造业发展,并且这种影响在不同形态的制造业产业链上表现不同;其次,制造业集聚通过静态需求和动态产业链演化影响生产者服务业布局。陈菁菁^[58]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协调问题发现,不论是在都市圈内,还是在单个城市内部空间,两者均存在空间协同定位现象,而且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布局的影响大于制造业对它的影响;在具体行业上,因辐射半径不同,不同服务业行业的聚集程度也不同,在都市圈内,更依赖面对面交流的生产者服务业,很难跨越都市圈与其他地区的制造业互动,但更多使用通信技术的生产性服务业,则容易跨过都市圈与相邻地区的制造业存在互动。席强敏^[59]研究了与陈菁菁相似的问题,不同的是,他指出在都市圈、城市和工业园区等空间单位内都存在“中心-外围”的产业空间模式,而且生产性服务业比制造业更偏向在中心区布局。

总之,国内文献聚焦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布局关系。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是否存在双重集聚,因不同生产性服务部门的贸易成本而不同,其中,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集聚的贸易成本中介效应大于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或者当生产性服务业的贸易成本较高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者就存在“协同式集聚”关系^[60-61]。在空间上,城市规模越大,双重集聚效应越高,且对其他城市的双重集聚的辐射作用随距离递减^[62]。

四、服务业空间分布与城市等级关系

上文在服务业集聚特征论述中,对服务业在城市体系中的空间分布有所涉及。当前,国内外文献普遍指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于少数大城市,在空间上形成了不均衡的层级结构,即城市的层级越高,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就越大、产值比重就越高^[36, 63-64]。在空间布局的动态方面,Gong^[65]研究

了美国 1977-1996 年间典型生产性服务(即商务和专业服务业,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在城市间的集聚与分散过程,将布局变化分成三个阶段:初期阶段,商业和专业服务业的产值比例在高层级大城市增长,在中小城市的比例下降;中间阶段,商业和专业服务业在层级高的大城市开始分散,而在中等城市的比例上升;最后阶段,低层级的小城市该类服务业产值比例也提高。Léo 和 Philippe^[66]发现巴黎的商业服务业在经历一段时间的极化式增长以后,开始向第二层级的大都市区扩散。

上述文献都是围绕服务业空间分布对城市等级体系的单向分析,即服务业在城市体系内的分布及其动态演化。此外,还有文献研究了高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于大城市辐射范围和世界城市体系的影响。Noyelle 和 Stanback^[57]对美国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发现,高端服务业在少数大城市布局,使首位城市(纽约)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地位更加突出;Daniels^[67]认为,服务业是重塑城市体系的重要动力,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更显著地影响着世界城市体系的调整;作为世界城市体系的提出者,Sassen 强调生产性服务业在划分城市结点中的特别意义,从“世界级城市”、“国家级中心城市”到“地区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程度和辐射范围逐渐递减,而生产性服务业高度密集的世界级城市则是跨国公司实现全球经营协调和控制的核心结点^[56, 37]。

目前,文献尚较少涉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宣烨^[43]按人口规模、人均 GDP 将城市划分为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在此基础上研究了不同城市的服务业优势,发现大城市在中高端服务业上更有优势。在动态上,Mulligan 等^[68]指出,无论城市体系如何变化,高端服务业总会向高等级城市集聚。陆铭、向宽虎^[2]研究发现,第三产业(近似于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到大港口的距离之间呈现“∩”型曲线关系,即随着距离拉大,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表现为“先降-后升-再降”的特点,从而使服务业在沿海或大城市附近聚集显得非常重要,而且服务业这种聚集不会使城市体系分散化。Yang 和 Anthony^[29]研究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在城市间的分布特征后指出,生产性服务业不仅改变了中国城市体系,而且影响了城市体系的内部联系。

五、评述与研究展望

在服务业空间分布上,已有文献主要从城市体系上的分布和城市空间内部分布两个维度展开,且以后者为主,侧重于研究城市内部服务业集聚的动态变化。对于前者,文献更侧重于测算全国或区域层面的服务业集聚程度,测算方法包括区位熵法、赫芬达尔指数法、空间基尼系数法、EG 指数法等。

城市是服务业发展的天然载体和理想空间^[21, 69],不仅城市内部空间的服务业分布很重要,而且城市之间的服务业分布对区域经济、城市体系也有重要意义。尽管文献研究了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在城市体系中空间分布的层次特点,也指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大城市控制力、竞争力、影响力的作用,但是与城市体系规模分布规律的研究深度不相匹配。

目前用齐普夫 (Zipf) 指数或规模-位序规则检验城市体系合理性的国内外研究已经非常丰富,但使用类似方法研究城市体系上服务业空间分布规律的文献非常少见。城市与服务业有着天然的共生关系,与城市规模分布类似,服务业的空间分布也存在层次性,不仅现代服务业增长深刻地影响着城市的国际、国内地位,而且服务业的空间分布也显著影响城市间的经济关系,进而影响区域经济发展。那么,既然规模-位序规则是判断城市体系合理性一种准则,这种准则是否也可以评判服务业在城市体系的空间分布合理性呢? 这个问题在理论上还没有得到解释,未来研究时可借鉴中心地理论、新城市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理论中的城市体系模型方法。如果上述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种方法可作为测算服务业集聚方法论补充,应用于分行业测算更能为城市规划部门提供参考。

与这种研究相近的文献如 Ulubasoglu 和 Hazari^[70]、Blackwell 等^[71] 研究发现,旅游服务的游客数量符合齐普夫规则 (Zipf's Law) 和幂律规则 (Power Law); 柳坤等^[72] 是采用规模-位序方法研究服务业空间分布的少有文献。然而,对中国服务业空间分布全面、细致地测算,对认识服务业是否健康发展意义重大,是服务业可行的、亟需研究的重要领域。

参考文献:

- [1] 王向. 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 对经济学文献的评述 [J]. 浙江树人大学学报, 2015, (04): 1-12.
- [2] 陆铭, 向宽虎. 地理与服务业——内需是否会使城市体系分散化? [J]. 经济学季刊, 2012, (02): 1079-1096.
- [3] Krugman, P.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 99(03): 483-99.
- [4] Gill, Indermit, and Homi Kharas. An East Asia renaissance: 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 [M].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7.
- [5] Duranton G, Puga D. From sectoral to functional urban specialisation [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5, 57(02): 343-370.
- [6] Moulaert, F., Gallouj, C. The Locational Geography of 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 Firms: The Limits of Economies of Agglomeration [J].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1993, Vol. 13 (02): 91-106.
- [7] Pinch, S. and Henry, N. Paul Krugman's Geographical Economics, Industrial Clustering and the British Motor Sport Industry [J]. Regional Studies, 1999, 33(09): 815 - 827.
- [8] Senn, L. Service Activities' Urban Hierarchy and Cumulative Growth [J].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1993, 13 (02): 11-22.
- [9] 陈国亮. 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研究 [D]. 杭州: 浙江大学, 2010.
- [10] 张勇. 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实证研究 [D]. 沈阳: 辽宁大学, 2012.
- [11] Krenz A. Modeling Services Sectors' Agglomeration within a New Economic Geography Model [J]. Center for European Governance &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 Discussion Papers, 2012.
- [12] 李文秀. 服务业的城市集聚机理理论与实证研究——来自纽约、东京的例证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J]. 产经评论, 2012, (04): 36-45.
- [13] 张军, 刘晓峰, 谢露露. 中国服务业的新经济地理特征 [J]. 统计研究, 2012, (05): 66-72.
- [14] 王耀中, 任英华, 姚莉媛. 服务业集聚机理研究新进展 [J]. 经济学动态, 2010, (04): 104-108.
- [15] Daniels P W. Service industries: a geographical appraisal [M]. Routledge, 1985.
- [16] Coffey W J, Bailly A S. Producer services and flexible production: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J]. Growth and Change, 1991, 22(04): 95-117.

- [17]陈建军,陈国亮,黄洁.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来自中国222个城市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09,(04):83-95.
- [18]Keeble, D., Nachum, L. Why Do Business Service Firms Cluster? Small Consultancies, Clustering and Decentralization in London and Southern England[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02, 27(01): 67-90.
- [19]朱铃.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产业间差异分析——基于产业特性与空间外部性三来源交互作用的视角[J].世界经济情况,2012,(07):101-106.
- [20]Ruiz-Valenzuela J, Moreno-Serrano R, Vaya-Valcarce E. Has concentration evolved similarly in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 A sensitivity analysis[R]. University of Barcelona, Research Institute of Applied Economics, 2007.
- [21]Kolko J. Urbanization, agglomeration, and coagglomeration of service industries[M]// EL Glaeser eds. Agglomeration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151-180.
- [22]Coffey W J, Shearmur R G. The growth and location of high order services in the Canadian urban system, 1971-1991[J].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1997, 49(04): 404-418.
- [23]Shearmur, Richard, and David Doloreux. Urban Hierarchy or Local Milieu? High-order Producer Service and (or)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 Location in Canada[R]. 2007, Toronto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 [24]Illeris, S., Sjøholt, P. The Nordic Countries: High Quality Service in a Low Density Environment[J]. Progress in Planning, 1995, 43(02-03): 205-221.
- [25]Bennett R. J., Graham D. J. & Bratton W. The Location and Concentration of Businesses in Britain: Business Clusters, Business Services, Market Coverage and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999, 24(04): 393-420.
- [26]Krenz A. Services Sectors' Agglomeration: the EU, Greece, and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J]. Greece, and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2012, 7: 221-257.
- [27]Polèse, Mario, and Fernando Rubiera-Morollón. On the Difficulty of Compar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ervice Industries Across Nations: Contrasting Spain and Canada[J]. Service Industries and Regions, 2013. 365-386.
- [28]管驰明,高雅娜.我国城市服务业集聚程度及其区域差异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11,(02):108-113.
- [29]Yang FF., Anthony G O. Growth and Spatial Development of Producer Services in China[J]. Tropical Geography, 2013, 2: 011.
- [30]Wang, Enru. The service sector in the Chinese economy: a geographic appraisal[J].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09, 50(03): 275-300.
- [31]杨向阳,童馨乐.长三角地区服务业集聚的实证分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4):59-64.
- [32]李华香,李善同.中国城市服务业空间分布的特征及演变趋势分析[J].管理评论,2014,(08):22-30.
- [33]黄雯,程大中.我国六省市服务业的区位分布与地区专业化[J].中国软科学,2006,(11):60-73.
- [34]李佳铭,孙铁山,张文忠.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特征与模式研究——基于地级市的实证分析[J].地理科学,2014,(04):385-393.
- [35]Wood, P. A service-informed approach to regional innovation or adaptation[J].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2005, 25(04): 429-445.
- [36]刘曙华,沈玉芳.国内外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现状与趋势分析[J].创新,2010,(06):64-68.
- [37]邱灵,方创琳.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与城市发展研究[J].经济地理,2012,(11):76-80.
- [38]Ciccone, A. Agglomeration Effects in Europe[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2, 46(02): 213-227.
- [39]范剑勇.产业集聚与地区间劳动生产率差异[J].经济研究,2006,(11):72-81.
- [40]程大中,陈福炯.中国服务业相对密集度及其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J].管理世界,2005,(02):77-84.
- [41]刘丹鹭.集聚与服务生产率:基于需求视角的分析[J].南大商学评论,2012,(17):60-74.
- [42]王晶晶,黄繁华,于诚.服务业集聚的动态溢出效应研究——来自中国26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4(03):48-58.
- [43]宣烨.我国服务业地区协同、区域集聚及产业升级[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100-110.
- [44]王琢卓.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J].湖南社会科学,2013(06):152-155.
- [45]陈宪,黄建锋.分工,互动与融合: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演进的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4,(10):65-71.
- [46]顾乃华,毕斗斗,任旺兵.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文献综述[J].经济学家,2006,(06):35-41.
- [47]路红艳.生产性服务与制造业结构升级——基于产业互动,融合的视角[J].财贸经济,2009,(09):126-131.
- [48]高觉民,李晓慧.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机理:理论与实证[J].中国工业经济,2011,(06):151-160.

- [49] Au CC, Henderson J V. Are Chinese cities too small?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6, 73(03): 549-576.
- [50] Coffey W J, and Bailly A S. Producer Services and Systems of Flexible Production [J]. Urban Studies, 1993, 29(06): 57-68.
- [51] 薛立敏,等.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关系之研究[M].台北: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1993:45-48.
- [52] Raff H and Ruhr 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Producer Services: 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J]. Applied Economics Quarterly, 2007, 53(03): 299-321.
- [53] 黄永兴,刘莉.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生产性服务业与产业集聚[J].统计教育,2007,(06):57-60.
- [54] 陈娜,顾乃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分布协同效应研究[J].产经评论,2013,(05):35-45.
- [55] Bhagwati J N. Splintering and disembodiment of services and developing nations [J]. The World Economy, 1984, 7(02): 133-144.
- [56] Sassen, S. The Global City. Princeton [M]. New Yor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 [57] Noyelle T J, Stanback T M.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ities[M]. Totawa, NJ: Rowman & Allanheld, 1984. 254-263.
- [58] 陈菁菁.空间视角下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调发展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1.
- [59] 席强敏.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协同布局研究——以京津冀都市圈为例[D].天津:南开大学,2013.
- [60] 赵伟,郑雯雯.生产性服务业-贸易成本与制造业集聚:机理与实证[J].经济学家,2011,(02): 67-75.
- [61] 谭洪波.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集聚:基于贸易成本的研究[J].世界经济,2015, (03): 171-192.
- [62] 李强.基于城市视角下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双重集聚研究[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3 (01): 70-78.
- [63] 赵群毅,周一星.西方生产性服务业的地理学研究进展[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6,(06):49-55.
- [64] 李松庆.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布局研究:文献综述与展望[J].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4): 16-22.
- [65] Gong H. A hierarchical change model of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J]. Urban geography, 2001, 22(04): 340-359.
- [66] Léo P Y, Philippe J. Executives and business services: Key factors of French metropolitan growth[J]. 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2007, 27(03): 215-232.
- [67] Daniels P W. Service Industries in the World Economy [M]. Hoboken: Wiley-Blackwell, 1993: 113-166.
- [68] Mulligan G F, Partridge M D, Carruthers J I. Central place theory and its reemergence in regional science [J]. 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2012, 48(02): 405-431.
- [69] 陈泽鹏,李文秀.区域中心城市服务业空间布局实证研究[J].广东社会科学,2008,(01):31-36.
- [70] Ulubasoglu, MA, and BR Hazari. Zipf's law strikes again: the case of tourism[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4, 4(4):459-472.
- [71] Blackwell Calvin, Pan Bing, Li Xiang, Smith Wayne. Power laws in tourist flows [R]. School of Business College of Charleston working paper, 2011.
- [72] 柳坤,申玉铭,刘辉.中国三大城市群服务业规模结构及演化特征[J].地理科学进展,2012,31(10):1289-1294.

(责任编辑:杨 磊)

The Researche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ervices: A Review

WANG Xiang¹, LIU Yinling²

(1. Energy Research Institute, the State Grid, Beijing 102209, China,
2. Dagong Global Credit Rating Co., Ltd, Beijing 100125,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reviewed the literature on services agglomeration and its impacts, services space distribution,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of the services and manufacturing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rvices and city-level.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services among different levels of the city is to be potential area for further research. And whether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ervices is consistent with Zipf's law is an important question to answer. To calculat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in a comprehensive and detailed way is a feasible research direction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Services; Agglomeration; Manufacturing; City-levels; Space Distribution